两会专稿

原油期货上市，对我国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方便我国广大企业利用本土原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管理风险，同时把宝贵的投资者资源留在国内。二是弥补现有国际原油定价体系的缺口，建立反映中国及亚太市场供求关系的原油定价基准。这不仅对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是一件好事。三是随着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原油期货市场逐步成熟、吸引力的增加，将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做商品期货对外开放的探路者。

“中国版”原油期货上市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姜 洋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将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原油期货上市，无论对于中国期货市场还是石油业来说，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定价基准“缺位”：“我的原油、他的定价”亟待改变

石油是世界主导性能源，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1/3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生产西移、消费东移的趋势逐渐形成。从2004年开始，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6.1亿吨，进口量4.2亿吨，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全球原油贸易定价主要按照期货市场价格作为基准。目前，国际上有10多家期货交易所都推出了各自的原油期货，其中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旗下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洲际交易所是世界两大原油期货交易中心，它们的西德克萨斯中质（WTI）原油期货、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分别扮演着北美和欧洲基准原油合约的角色。

尽管亚太地区的原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大，但在该区域内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期货市场为原油贸易提供定价基准和规避风险的工具。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都在建立原油期货市场方面开展了探索和尝试，但影响力都不大，没有形成原油贸易定价的基准。由于没有一个充分反映亚太地区原油实际供求情况的定价基准，因此亚太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新加坡普氏报价、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货价格等作为原油贸易的定价基准。但是这些价格并没有反映中国及亚太地区其他主要原油进口国的真实情况。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的价格，比欧美国家在同一地区购买同品质原油要高，这对于亚太国家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

十七载漫漫路：中国原油期货即将破茧而出

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上海期货交易所从2001年开始研究论证开展石油期货交易。原油是石油中最大、最基础的产品，由于当时上市原油期货的市场条件不够成熟，交易所对石油期货产品的上市路径作了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的策略：先从石油产品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燃料油起步，开展燃料油期货交易，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出其他石油期货。

2004年，燃料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经过近10年十分活跃的交易后，由于现货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其衍生品燃料油期货的作用随之消失，交易逐渐清淡。2013年，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了另一个石油期货产品——石油沥青期货。目前，石油沥青期货的成交量在全球能源期货合约中排第五位。通过燃料油期货、石油沥青期货交易，我们对石油期货合约的设计、交易结算、交割流程、仓库管理、风险控制、市场监管等作了全流程的实际检验和完善，为原油期货上市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与国内其他商品期货品种不同，原油期货从一开始设计时就定位为一个国际化市场，对全球的投资者，包括跨国石油公司、原油贸易商、金融机构开放。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妥推出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的要求。同年，我国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作出修改，删除了限制外国人参与国内期货交易的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境内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为原油期货上市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期货市场作出“要脚踏实地，大胆探索，努力走出一条成功之路”的重要指示后，中国证监会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加快了推进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的步伐，包括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资委、能源局、外汇局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等20多家部委与企业，从产品设计、交易结算、交割安排、市场参与者制度、标的原油确定、海关申报、税收制度、监管规则调整、跨境监管安排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组织协调和筹备。在这些部委、相关机构与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原油期货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平衡兼顾各方：合约设计主要考虑4因素

上海期货交易所在设计原油期货合约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期货合约标的物——选什么油的问题。2017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8%。进口原油中43%来自中东地区，是我国原油进口最主要的来源。综合考虑我国进口原油品种结构和实体经济需求，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合约以区别于WTI和Brent的中质含硫原油作为标的。

二是计价和结算货币——用什么货币定价的问题。国际原油现货贸易大多用美元计价和结算，主要原油期货合约WTI、Brent以及阿曼原油期货等，也都是用美元计价和结算。印度、日本等国推出的原油期货合约在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上作了探索。我国原油期货合约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但外币可以作为保证金使用，平衡兼顾了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的需求。

三是可交割油种——哪些油可以交割的问题。我国原油期货采用实物交割方式，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交割风险。因此，确定哪些油作为可交割油种非常关键。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原油期货可交割油种一共有7种，以中东原油为主，包括阿联酋的迪拜原油和上扎库姆原油、阿曼原油、卡塔尔海洋油、也门马西拉原油以及伊拉克巴士拉轻油等6种。同时，胜利原油作为唯一的国产原油被纳入可交割油种。

四是指定交割仓库——运油和交油。与国际原油贸易90%靠海运相同，我国进口原油也主要靠海路运输。原油期货上市初期启用的6家指定交割仓库8个存放点，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充分考虑了沿海海运方便、靠近大型炼油厂和原油集散地、南方和北方兼顾等因素。下一步，随着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的多元化，上海期货交易所将及时优化指定交割仓库布局，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

此外，原油期货将依托保税油库实行“保税交割”，主要是考虑保税现货贸易的计价为不含关税、增值税的净价，方便与国际市场不含税价格直接对比，同时避免国内税收政策变化对交易价格产生影响；保税贸易对参与主体的限制少，保税油库可以作为联系国内外原油市场的纽带，有利于境外投资者参与交易和交割。

四大意义凸显：补充完善国际原油定价体系

在我国推出原油期货的过程中，西方媒体非常关注。观察西方媒体的报道，它们主要担心两个方面：一是担心中国推出原油期货，将削弱WTI和Brent原油期货在国际原油定价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担心石油人民币会抢占石油美元的份额，动摇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推出原油期货主要是基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

原油期货上市，对我国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其一，方便我国广大企业利用本土原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管理风险，同时把宝贵的投资者资源留在国内。

其二，弥补现有国际原油定价体系的缺口，建立反映中国及亚太市场供求关系的原油定价基准。这不仅对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是一件好事。

其三，随着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原油期货市场逐步成熟、吸引力的增加，将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四，做商品期货对外开放的探路者。商品的同质性、现货市场的自由贸易和大宗商品贸易适用“一价定律”，决定了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天然属性，因而对外开放更加紧迫。原油期货在开放路径、税收管理、外汇管理、保税交割及跨境监管合作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可逐步拓展到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其他成熟的商品期货品种，进而推动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全面开放。

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市场的成熟和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渐进培育的过程。我们在推进原油期货市场发展的同时，要不断强化市场一线监管和风险管理。除严格遵守目前国内期货市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交易编码制度、保证金制度、持仓限额制度、大户持仓报告制度、穿透式监管制度等，我们还将针对原油期货“国际化市场”的特点，积极落实交易者适当性审查、一户一码实名制开户、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申报，强化资金专户管理和保证金封闭运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市场风险，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和正常交易秩序。

两会特写

政协委员为东北振兴“出主意”——

东北振兴需要新动能

本报记者 魏永刚

“东北振兴需要新动能。”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旅游发展委主任杨安娣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说：“说‘投资不过山海关’，那怎么解释那么多企业在东北投资兴业？而且，东北经济从去年到今年整体出现了向好势头。”她同时强调，东北振兴确实需要在新动能上想办法。

东北振兴必须走出一条新路，要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杨安娣委员说，实现这个目标，寻找发展新动能十分重要。旅游产业是培育东北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产业之一。

杨安娣委员呼吁大家从发展新动能方面来认识旅游。她分析说，吉林省守着两种资源：冬天的“冷”资源，夏天的“凉”资源。这两个资源意味着“两个3亿人”的巨大市场：一个是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特别是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中国的冰雪运动蓬勃兴起，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再一个是3亿人的潜在避暑人群。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为旅游业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冰雪运动的蓬勃兴起为冰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把目光投向旅游业，能够给地区发展带来新动能。

同为来自东北的赵雨森委员，是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他接过东北振兴需要新动能的话题说，新动能也要重视人才。他认为，观念落后和负担太重是制约东北振兴的两大原因。他建议养老实现国家统筹，帮助东北地方减轻负担，同时要重视东北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他深感这几年人才流失严重，年轻人走得多，很多教师走了；老企业培养出来的高等级技术工人也有很多离开了东北；再一个是大学生，外省来东北读书的留不下来，本省出去上学的不回来。他说，“东北振兴需要人才，需要政策，需要资金，确实要寻找新动能”。

多位政协委员关注学生减负问题——

减负是社会共同责任

本报记者 刘 瑾

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一直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多年来，经历多次“减负运动”，我国中小学生的“减负”成效并不明显，甚至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加负”等现象。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表示，应尽快摒弃流水线式“刷题”教育。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一是因为学校应试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是各种落后的社会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学生家长。三是各式各样的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加剧了学生课业负担。

胡卫委员建议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机械性重复操练，减轻无谓学习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过重的学业负担导致中小学生的休息权被剥夺，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要切实保障学生休息权。减轻学生负担，要全面推进义务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弱化区分度和选拔性，使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而不是只对分数负责，对学生的终身负责而不是只对眼下负责，对所有学生负责而不是只对能升入名校的学生负责。

“‘玩’才是孩子的天性。”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殷福星表示，呼吁“减负”多年不见成效，其原因与现阶段家长心态相关。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上名校与孩子未来的人生幸福等同，是孩子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志。其实，“玩”才是孩子的天性，过多参加培训班并不能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

几位委员一致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

政协委员谈工科优秀人才培养——

以工程人才托举制造强国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剑

“我国人才的数量质量远不能适应制造强国建设需要，不能适应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等融合发展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在教育界别小组讨论时说，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实行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他的话引起多位教育界委员的共鸣。

“要注重改变培养方式，培养具有创新思维、掌握共性技术和关键工艺的复合型人才。”全国政协委员、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曾勇认为，现代工程技术和先进制造业，都需要多种技术系统集成。因此，大学要注重以跨学科、交叉班的方式，培养训练学生的系统集成能力。曾勇委员介绍，电子科大已经开设智能制造实验班、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课程横跨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需学习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等技术知识。毕业时，学生能根据自己所修课程获得相应的双学位。

“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模式是发展方向，我们的学生就是产教融合的受益者。”针对制造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介绍，早在2015年，学校就与新松机器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机器人核心技术产学研合作研究平台，学生能够在新松的工厂里试验、实习，校企共同探索做大做强国产机器人产业。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说，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主动融入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使命中，兰大目前正结合区域发展重大课题大力补齐工科短板。讨论交流中，委员们反映，工科院校在制造人才培养方面还面临不少共性问题。

在培养模式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应探索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协同的育人模式，形成优势互补、项目共建、成果共享、利益共赢的人才培养共同体。

我国工科教师存在着实践能力不足等欠缺。在制造业较发达的德国，工科大学教授须有企业工作经历，促使他们在培养人才时，会将企业需求、技术创新、工程能力融入其中。曾勇委员认为，这种经验值得借鉴，工科教师应该具有跨学科研究和业界实践的经历，建议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搭建实践平台，学校的考评机制也应作出调整。

“制造业职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较低，部分学生存在重视虚拟经济、轻视实体经济的观念。”赵长禄委员反映，待遇偏低影响行业吸引优秀人才。对此，委员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制造业特殊人才培养战略，使优秀人才愿意留在装备制造业，为高端制造业发展贡献力量。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就本组关注的热点问题议政建言。会后，全国政协委员丁秀花、罗黎明、石红（从左至右）就有关问题继续讨论。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委员：

让涉企政策更接地气

本报记者 王 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专门用一长段的篇幅来讲民营企业发展，让我感到很振奋。”

“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报告中提到‘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王文银委员说，处在市场一线的企业家，更加了解产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最容易发现某个领域问题和痛点的一群人，多吸纳企业家的意见，有助于让涉企政策“不跑偏”、更接“地气”，让经济政策更贴合市场创新需要，也让企业家权益更有保障。

在王文银委员看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这保障了企业家话语权，也更加有助于企业家创新。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第一个就提到要推动集成电路发展。王文银委员表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好，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让企业家们创新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王文银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国家的竞争靠实力，实力的竞争靠企业，企业的竞争靠产品，产品的竞争靠品牌，品牌的竞争靠人才。最后一切的竞争都是品牌和人才的竞争。我们要创造条件，把全球顶尖人才引进来。”